

幫會、行會與社會： 幫會的特質

文・圖／李弘祺

世界上最有名的幫會可能就是起源自西西里的黑手黨。從西西里遷移到美國紐約的移民繼續了黑幫的傳統，在上一個世紀發展，成了美國最大的黑社會組織，成員多達3,000 人（2017年FBI的資料）。當然，由於《教父》電影，我們對他們總是有一種非常曖昧的印象：遵守組織的嚴格內規，就是殺人也使命必達；另一方面，為實現組織的理想，就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如此「高超的美德」在東亞儒家教育下的一般人看來，才是為人的最基本道義。進一步說，很多幫會都曾經被政府徵召去做正規執法機構不好出面去做的事，連黑手黨人也不例外，而他們也頗自豪，認為他們是愛國的義大利裔公民。

以上的簡單介紹相信一定會讓人們想到臺灣的竹聯幫。其實，按照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資料，竹聯幫有多達一萬人的會員，豈是黑手黨可比擬。我常常笑說，多年替臺灣黑幫拍電影的朱延平不幸英文不夠好，不然如果像吳宇森一樣



《教父》電影讓人們對美國紐約的黑幫產生一種曖昧的浪漫看法。

到好萊塢發展，說不定會成為世界級的黑幫大導演。

研究中國幫會歷史的戴玄之認為中國的秘密社會可以上溯到明代，他的看法影響了整個領域的研究方向。但是怎麼可能在明代以前沒有類似幫會的秘密組織？一定有的。有趣的就是清朝以前的中國歷史典籍裏，不僅沒有「幫會」或「幫派」這樣的字眼，就是「幫」這個字也是到了宋代以後才有結黨成幫的意思。在宋代以前，它通常是指城邦的邦，或者是指駱駝背上的峰。宋代以後才出現「幫寇」、「幫子」的語詞，「幫忙」或「幫助」也是宋代以後才出現。換言之，現代人所說的幫會，在宋代以前並沒有這樣的用語。

當然，我們都會同意，秘密結社或秘密社會曾經以各樣不同的名稱存在於宋代以前的中國。但是就如同故唐德剛先生常常說的「傳統中國有國家，但是沒有社會」，傳統中國的確說不上有現代意義的社會。這就是為什麼當西方的「社會學」興起時，梁啟超會把它翻譯成「群學」。「社」跟「會」這兩個字都是中國原有的觀念，也是曾經存在的實體。但是中國史學家從來不加以重視，也因此從來就沒有法律保障的獨立地位。如果這樣的社會組織要追求不受政府的管制，那麼就會變成所謂的叛亂團體。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，那就是非政府的社與會，實際上不會是人們做道德褒貶時需要考慮的元素。

中國社會的組織還有「行會」，它和商業行為有密切的關係，但「行」的出現恐怕也是唐宋以後的事。《夢粱錄》記錄宋代杭州有各樣的「行」，而《黑韃事略》這本書也說在蒙古人控制下的北方，



前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唐德剛說：「傳統中國只有國家，沒有社會。」



「丐幫」因金庸小說《射雕英雄傳》而有名。宋代時中國北方就有「乞兒行」。

竟然有「教學行」、「乞兒行」的組織。明末又出現很多的社，如東林黨人的「復社」，它就是正統思想下的正面組織，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他們是一種幫會。

以上主要是說，中國當然有社會，但是政府屬下的機制，沒有合法獨立存在的空間，如果想要爭取自外於政府的空間，那麼唯一的結局就是被視為叛亂團體。例如黃巾、孫恩、盧循、王小波、張獻忠、李自成等等所領導的所謂「起義」，不能不說起初本來可以是一種「幫會」，但是由於沒有存在的空間，所以就變成了動亂。

由此看來，中國社會發展到了唐宋以後，各樣組織開始出現，政府逐漸失去系統地全面監督或控制的能力。事實上，政治性質的「黨」也開始成型。在這之前，任何「黨」都是被否定的，正如孔子所說：「君子群而不黨」，所以漢代的黨錮被稱為禍，唐代的牛李黨爭也被認為是唐代覆亡的重要原因。但是到了宋代，歐陽修竟然寫了一篇有名的〈朋黨論〉，認為結黨是很自然的事，即使君子也是如此，皇帝好好利用就好。如果不讓君子結黨，那反而會亡國。蘇軾也寫了一篇〈續歐陽子朋黨論〉，補充歐陽修的看法，而且更為寬鬆，認為不能對小人之黨趕盡殺絕：



清人潘齡皋書歐陽修〈朋黨論〉的部分。



20世紀四川的哥老會相片。

「奸固不可長，而亦不可不容也。若奸無所容，君子豈久安之道哉！」不僅承認結黨的不可避免性，更進一步認為即使小人結了黨也必須縱容，免得君子因此不敢結黨。可見宋代以來，幫會朋黨之類的組織逐漸被讀書人所認可，而到了明末，連讀書人也知道除了在政府裏難免需要結黨結派，就是在社會上也少不了必須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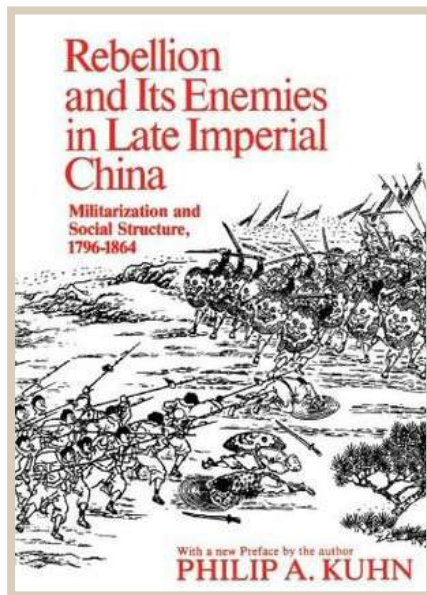
孫中山與洪門黨人合影。

員相同理念的人組成所謂的社，像最有名的復社、幾社、中江社（桐城）或登樓社（杭州）都是。另外，以會為名的，如省過會、茶會、惜陰會（王陽明有「惜陰會說」）等也是類似的組織，他們與天地會、哥老會或洪門會不完全相同。在傳統中國，前者的發展被視為是正面的，因為他們反映的是傳統道德價值。

事實上，只有少數的學者認為明末文人的結社是屬於現代人所說的幫會。不過如同我在上文所說的，就是現代的幫會也有受政府歡迎的活動，所以傳統民間的結社也會有正面的貢獻。只是因為不是讀書人的組織，所以沒有能在中國歷史想像裏佔有正面的形象。

如上所說，幫會活動在明末已經發展得很興盛，除了因經濟繁榮，反映資本主義萌芽的特色，也因明遺民以及鄭芝龍、鄭成功一家人的活動，像洪門及天地會多與「反清復明」的活動有關連，而為儒家正統思想認可。青幫是從漕運幫發跡，而漕運幫多是護衛漕運（運河運糧）的失散兵勇（下層士兵）所組成，他們茁壯之後，政府往往取其方便，徵用他們來保護糧運，於是青幫到了滿清中期就發展成很大的幫派，連地方政府都要看他們的眼色。正規軍隊雖然歸朝廷命官帶領，但是下層部隊完全是幫會成員，官軍與幫會竟然變得很難分清楚。50年前，哈佛大學教授

李弘祺 專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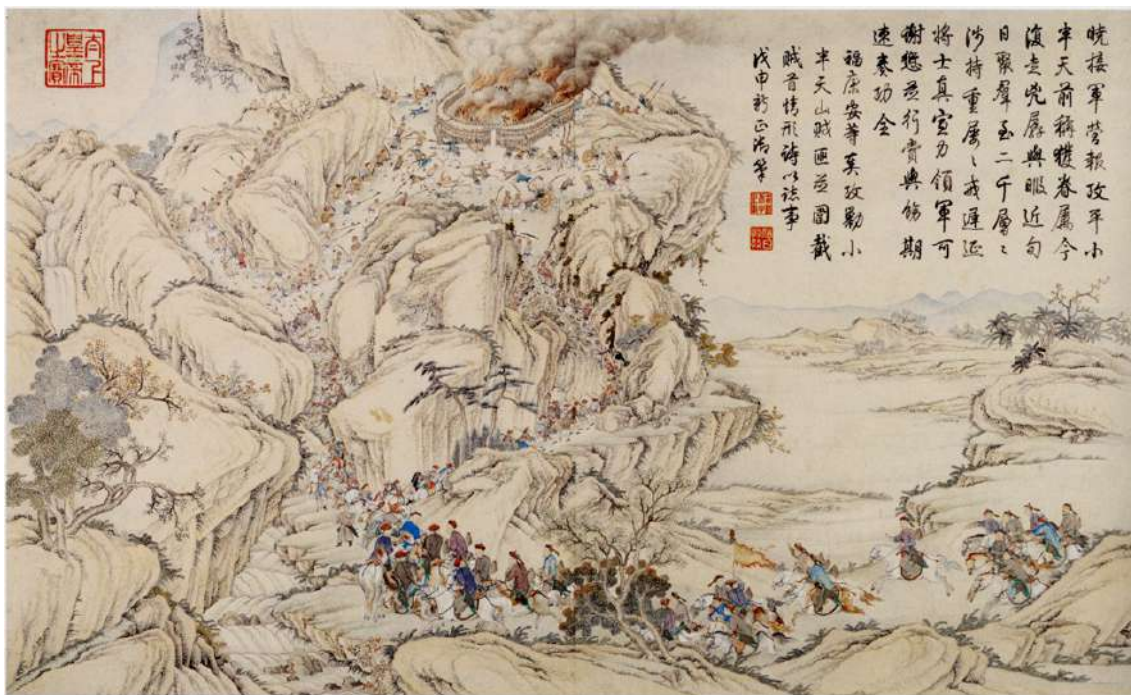
故哈佛大學教授孔腓力（Philip Kuhn）所撰《叛亂及其敵人》。

孔腓力（Philip Kuhn）寫了一本書，題為《中華帝國晚年的叛亂及其敵人，1796-1864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》（*Rebellion and Its Ene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,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1796-1864*；按：此書雖然很早就翻成中文，但是不如他其餘的作品受到中文世界的重視。）。書中就指出地方正規軍隊與叛亂集團的組織方式非常相似，等於是說政府軍（以「團練」為代表，團練就是地方士紳召集的地方武力）隨時可以淪落為流寇，而叛亂集團（以「鏢店」為代表）必要時可成為地方政府仰賴維持治安

的官兵。這樣的說法也有很多人提起過，但是系統的學術研究則以他的說法最受注意。（清末名法律史專家沈家本說：「匪類游息日久熟悉地形，兵至則散而為民，兵退則聚而為盜」。）

在臺灣，從鄭芝龍及鄭成功父子的時代開始，幫會的性質就已經非常明顯，特別是洪門。洪門又和天地會結合，其中以林爽文為最有名。林爽文之「亂」是臺灣近代史上的大事。事實上，中國近代史上的幫會很多都與閩越地區有關，而臺灣作為福建移民外國的大本營，自然與幫會的發展有千絲萬縷的關係。1949年以後，國民黨政府來臺，也把青幫帶入臺灣，像海軍就長年受到青幫的支配。簡單地說，中華民國革命史和幫會集團的活動是分不開的。前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廷教授在他寫的孫逸仙傳記（*Sun Yat-Sen: Frustrated Patriot*）中就詳細描繪孫先生一輩子與幫會之間的各種交葛。

游移於正統思想與武力替天行道之間的中國近代幫會，其道德觀念與傳統儒家思想、民間宗教（特別是佛教）倫理，以及元代以後發展出來的善書都有



天地會黨徒林爽文在臺灣「叛亂」。圖為福康安來臺在小半天（今鹿谷）「圍截山賊」。

關係。自來研究的人很多，希望未來有機會再做介紹，好說明為什麼到了今天，幫會的義理世界和造假的武俠小說還是那麼吸引人。（2020年6月12日寫於紐約華萍澤瀑布）



李弘祺小檔案

1968 年歷史系畢業，耶魯大學博士。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、紐約市立大學、臺灣交通大學、也曾在本校、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。專攻中國教育史、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，以《學以為己，傳統中國的教育》為最重要，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。日本關西大學《泊園》學刊稱許為「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」。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，主持臺積電及敏隆講座。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。